

## 第二章 北京牛街回族社區的形成與重組

### 第一節 牛街回族溯源與回族社區的建立

本論文指稱的「牛街回族社區」，即為現今中國北京市宣武區行政區劃下的「牛街街道辦事處」之範圍，此點已在本文第一章的研究設計加以說明。

#### 一、牛街一詞的由來與演變

牛街是北京市內一條古老的街道，位於現今北京市宣武區西南隅，呈南北走向，北起廣安門大街，南至南橫西街，此街一帶為北京市最大的回族聚居區，以牛街為中心，在其東西兩側，有大大小小幾十條胡同，居住著數以萬計的回族居民。牛街回族聚居區由於歷史悠久，不僅在國內聞名遐邇，在國外伊斯蘭世界裡更是耳熟能詳的回族聚居區代表。

牛街，曾名「石榴街」、「柳河村」、「岡上」、「牛肉胡同」，這些不同的名稱，正好代表著幾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反映其歷史沿革。

在中國宋、遼時期這一地區「地勢低窪，長年積水，形成一片水鄉，河渠縱橫，楊柳垂蔭，時稱柳湖村或柳河村。又因河道旁有一土岡高聳。」<sup>1</sup>故稱為「岡上」。從歷史上看，牛街地區曾是一片果樹林，有櫻桃林、核桃林、棗樹林和石榴林，穆斯林喜歡種植棗樹林和石榴樹，在《遼史·地理志》中記載了「南京，又曰燕京（即今日北京）。城方三十六里，其東南有榴河村」，<sup>2</sup>因此有人說牛街就是「石榴街」的諧音，但在劉東聲、劉盛林先生合著的《北京牛街》一書中卻認為石榴自漢代已傳入中國，而受限於北京的氣候，石榴不能遍植成林，只適合於盆栽內觀賞，且遍查坊巷籍志均不見榴街之名，故認為榴街一名，應是怕牛街之名不雅，便以榴街代稱加以雅化。<sup>3</sup>

《北京牛街》一書中提到，金海陵王篡權於貞元元年（西元 1153 年），遷都於燕京後，改燕京為中都，從此大力營建中都，城市中心西移到今日北京市白廣路西側附近，為了建設園林的需要，將城西西湖(蓮花池)的水引入城中，河流自西而東，入城後南流，牛街地區從此開始有了河流。最常被引證的就是至今仍留存的「吳家橋」之地名，因為在北京的地名中，以橋命名之處當年必定有水或河流經過，因此，牛街開始有了歷史上的「柳河村」這個名稱。但是後人認為柳河村的得名是因為元滅金後，金中都被大火燒毀，從此此處日漸荒蕪，以往繁華的宮殿，只剩下當初的護城河與在宮牆之外的垂柳，據此，我們可以推估元代之後

<sup>1</sup> 牛街禮拜寺編寫組，《牛街禮拜寺》，1996年，頁2。（內部刊物）

<sup>2</sup> （元）脫脫等撰，《遼史》，卷四十，〈地理志四〉，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494。

<sup>3</sup> 劉東聲、劉盛林，《北京牛街》，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年，頁4~5。

「柳河村」地名的出現，是其來有自的。<sup>4</sup>因此柳河村一名，最早也要到元大都建成後若干年，那時的金朝中都早已一片荒蕪，此時才有「柳河村」地名的出現。牛街，又稱為「岡兒上」，指今日的廣安門內、南線閣南口以東的一片空地，或許是因為牛街的西側房舍地基皆高出馬路的路面，有地勢高聳的特質，而有此名，「岡上」這個名稱到了清朝初年仍在使用的。

在《北京牛街》一書中談到，明嘉靖三十九年（西元 1560 年）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中：「……牛肉胡同，大聖安寺，小聖安寺，教子胡同……。」從其地名的排列而言，「牛肉胡同」應該就是今日的牛街。直到清代康熙二十五年（西元 1686 年），在《日下舊聞》曾提到，此後正式定名為牛街，沿用迄今。<sup>5</sup>

## 二、牛街回族先民遷徙歷程

### （一）當今回族的先民來源及其來華背景

要了解牛街回族的來源，勢必要先說明中國自唐朝以來，中亞與西亞各地的穆斯林如何進入中國，並隨著歷史的變遷逐步改變其民族身分，由「蕃客」、「色目人」變成爲「回回民族」之後，成爲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之後再說明歷經中國歷史變遷下牛街回族形成的狀況。

唐朝的國力強盛與善於接納外來事物的風氣，各國的商人、使者紛紛前往中國通商貿易，因此許多各地民族便定居在中國，娶妻生子，被稱爲「蕃客」、「胡商」，到宋朝時，已在中國繁衍了五世，稱爲「五世蕃客」，其中就有許多來自阿拉伯、波斯等國家。這些蕃客在居住上多圍寺而居，和中國其他民族的相處呈現一種半隔離的狀態。他們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人數很少，尚不具備形成民族的條件。

根據歷史文獻，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可追溯到唐高宗永徽二年（西元 651 年 8 月 25 日，伊曆 31 年 1 月 2 日），在《舊唐書·大食列傳》中：<sup>6</sup>

永徽二年，使遣使朝貢，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賦，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主矣。

說明了當時的阿拉伯帝國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644~ 656 年在位），正式派遣使者到唐朝首都長安覲見唐高宗，開啓了中華文化與伊斯蘭文化交流的第一頁。<sup>7</sup>此後，又爆發了安史之亂，至德二年九月（757 年），唐朝向大食等國借調

<sup>4</sup>劉東聲、劉盛林，《北京牛街》，頁 2。

<sup>5</sup>同上註《北京牛街》，頁 4。

<sup>6</sup>（五代）劉昫，《舊唐書二百卷》，卷一九八，〈大食列傳〉，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2659。

<sup>7</sup>參考邱樹森主編，《中國回族史》，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8；楊啓辰、楊華主編，《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發展和現狀》，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00。

兵源來平定鎮壓安祿山的叛軍，這在中國和大食的關係上是十分重要的事件。<sup>8</sup>

除了來中國的使臣外，也有許多人才，例如大食商人李彥昇，和南宋末年擔任泉州市舶使，集南宋沿海財政與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蒲壽庚。<sup>9</sup>由於政治上的互通使節，經濟上的頻繁交往，使得大批的大食和波斯商人留居在中國，而在安史之亂平定之後，許多的大食士兵便留在中國，根據宰相李泌對留居長安的穆斯林進行調查，發現竟有四千餘人之多，他們不願意回原先的家鄉，都加入了中國籍，接受中國的官職，政府給予他們一定的軍職或公職，安置到九江地區，<sup>10</sup>這是第一次有數量較多的西域穆斯林定居中國。

從唐永徽二年到五代、兩宋時期，大約六百多年中，大食、波斯穆斯林商人來華絡繹不絕，因為兩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來往，僑居在中國的穆斯林人數不斷增加，他們也就很自然地將伊斯蘭教帶入了中國，也是伊斯蘭教早期傳入中國的因素。

13 世紀以後，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進入另一個高峰，蒙古帝國成吉思汗大軍先後征服了蔥嶺以西、黑海以東的穆斯林地區，隨著戰爭的移轉，有大批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亞人來到中國，其中有被簽發的軍士、工匠和被俘掠的婦孺，也有一些宗教學者、社會菁英份子等，人數多達數十萬，其中年輕的士兵，被編入蒙古軍隊中的探馬赤軍之中服役，並成為蒙古征金、攻南宋的重要力量。他們立有戰功，許多人在蒙元政府中擔任從中書宰臣到地方的各級官吏，在元朝將人民依照民族分為四類中，被歸於「色目人」，地位僅次於蒙古人。<sup>11</sup>

色目人，即西域各族人，共 31 個民族，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回回，因此在元朝，他們的社會地位很高，在科舉、仕宦、刑罰等方面，都有較優越的待遇。<sup>12</sup>例如在元朝極為出名的賽典赤·瞻思丁，他是第一個被起用的回回人，在《新元史·賽典赤瞻思丁列傳》中：<sup>13</sup>

賽典赤瞻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回人，別庵伯爾之裔……至元元年，出為陝西五路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蒞官三年……

（至元）十年，帝謂賽典赤曰：「雲南朕嘗親至其地，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賽典赤受命退朝，繪雲南輿圖以上，帝大說，拜雲南行省平章政事，賜鈔五十萬抵緡。

<sup>8</sup>參考李興華等著，《中國伊斯蘭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5。

<sup>9</sup>張中復，《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 年，頁 13。

<sup>10</sup>同註 8，頁 39。

<sup>11</sup>邱樹森主編，《中國回族史》，頁 112。

<sup>12</sup>同註 8，頁 182。

<sup>13</sup>（清）柯劭忞，《新元史》，卷一五五，〈賽典赤瞻思丁傳列傳〉，台北市：藝文印書館，1955 年，頁 1474。

在《新元史·賽典赤瞻思丁列傳》對他的生平與作為也有極為詳細的描述，不僅在陝西、雲南各地任官，於至元十一年（西元 1274 年），更出任雲南行省平章政事，為雲南設立行省的第一任行政長官，加強了元王朝對雲南的中央集權統治，他進入雲南後，大批回回隨之進入雲南，開啓了雲南回族的來源，伊斯蘭教也隨之傳入，在當地建立許多的清真寺，對發展當地經濟、文化、教育、宗教等事業，貢獻良多。<sup>14</sup>

台灣學者張中復《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一書中提到，元朝時期，中國將世界各地來華的穆斯林稱之為「回回」，其政治地位、經濟地位、人口總數遠遠超過了唐宋時期的「蕃客」，而唐宋時期的「蕃客」後裔也早已華化，成為回回的一份子。此時，涵意籠統的「蕃客」一辭也被更具有宗教與民族特殊意義的「回回」所取代。<sup>15</sup>

元代的回回人正式編入國家的戶籍中，是在忽必烈統一中國（西元 1279 年）之後，元世祖下令各地的探馬赤軍在中國就地落戶，使得之前因為戰爭而駐紮在中國各地的色目人士兵，決定留在當地娶妻生子，再加上伊斯蘭教與生活習慣的因素，這些人很自然地聚族而居，造成了今日回族分布呈現大分散卻又小集中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發展和現狀》一書中，提到北京回族的主要來源起於元朝，在蒙古軍隊攻打中都之役中，首立大功者就是回回人阿剌淺，後被任命為達魯花赤（行政長官）而留駐中都（今日北京）。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西征時，帶回大批西域人士，其中有不少穆斯林的傳教士、商人、菁英份子前來中都，其中一部分編入探馬赤軍的穆斯林就地落戶，讓穆斯林人口日益增多，到一二五九年，中都地區的穆斯林就有 2,953 戶，人數應該有 1.5 萬人左右，相傳當時有清真寺 30 餘座。明朝時有大量的回族從中國各地來到北京，駐地屯墾的回回士兵留在北京城中的也不少，<sup>16</sup>成為今日北京回民的祖先。

然而從《岡志》述及北京回民之來源的「今燕都之回民，多自江南、山東等省份派來者。何也？由燕王之國，護衛軍僚，多二處人故也。教人哭父曰『我的達』，其亦山東俗也……」<sup>17</sup>這段話中，我們可以得知他們不一定全都是由元朝歷代所定居的穆斯林所組成，這也與在牛街流傳的：「祖先是隨燕王掃北，揪著龍尾巴來的」的說法不謀而合。中國學者佟洵在《伊斯蘭教與北京清真寺文化》一書中，提到她認為北京的穆斯林來源兩種不同的說法，一是明朝北京的穆斯林與元朝的穆斯林毫無親屬關係，只是同屬於伊斯蘭教而已；另一種則是明朝北京的回族除了元朝已居住在此的穆斯林之外，還有一部分回族是由江南、山東等地

<sup>14</sup>參考李興華等著，《中國伊斯蘭教史》，頁 190~191；邱樹森主編，《中國回族史》，頁 177~185；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 年，頁 474~475。

<sup>15</sup>張中復，《清代西北回民事變—社會文化適應與民族認同的省思》，頁 13。

<sup>16</sup>楊啓辰、楊華主編，《中國伊斯蘭教的歷史發展和現狀》，頁 36。

<sup>17</sup>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與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北京牛街志書—《岡志》修訂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 年，頁 33。

遷來北京的。<sup>18</sup>

明朝時有大量的回民進入北京，駐地屯墾的回回士兵留在北京城裡和大興等地的也不少，清朝時逐漸慢慢形成聚居區，這在下文將有詳細的描述。

直到今天，北京回族有五十多個聚居區，分布在街道、村、鎮，基於回族在北京市居住的時間悠久，以及人數眾多這些特點，在在超越了其他的世居少數民族，牛街回族可以被稱為都市世居少數民族是當之無愧的。

### 三、牛街回族聚居區的組成與發展

北京也和全國各地一樣，回族居住的狀況呈現大分散小集中，而牛街則是北京市內最為集中的回族聚居區，現今更成為外國與海外穆斯林了解中國城市回族生活型態的重要指標與窗口之一。

#### 1. 形成沿革

在歷史上，牛街地區位於唐朝幽州藩鎮城內，也就是位於遼的「五京制度」中的「南京」和金的首都「中都」城內，從這樣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出牛街回族聚居區，從歷代以來都位於各王朝的中心地帶，可謂居住在天子腳邊的重要位置。

元朝的大都建成後，元帝下令舊城內的居民遷徙到新城（金「中都」城之北）者，其條件是「以貲高及居職者為先」，<sup>19</sup>因此大官與富賈就優先搬入新城中，舊城只有貧苦人家居住，因而顯得更為荒涼，有段時間成為許多犯罪者的躲藏之處與走私買賣的交易地點，直到明朝初期，這一帶還是一片荒涼的地區。明嘉靖二十三年（西元 1544 年），為了首都的安全，建立了外城，將城外西南區圈入城中，也包括了牛街一帶，但仍未改變人煙稀少的狀況，由「官菜園」、「南菜園」現今仍留存的地名，便可得知當初這裡即是提供皇宮蔬菜的菜園所在地。

自清朝入關建立王權後，為了鞏固政權，下令要求非滿族的居民一律遷到外城居住，因此部分有錢有勢的回族居民，必須從北京城內的東四牌樓與西四牌樓（亦為《岡志》所說的「東西兩邊」）遷徙到城外的岡上村去，於是北京牛街一帶開始有了人煙，成為回族的聚居區。這段歷史變遷，從《岡志·小引》的內容可見一斑：<sup>20</sup>

明，宣武門之西南，地勢高聳，居教人數十家，稱曰「岡兒上」。居民多屠販之流；教之仕宦者，率皆寓城內東西牌樓，號曰「東西兩邊」。居兩邊者，視岡上為鄉野。嘉靖年間，增築外城，則岡上為城內地。明

<sup>18</sup>佟洵，《伊斯蘭教與北京清真寺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93。

<sup>19</sup>劉東聲、劉盛林，《北京牛街》，頁 9。

<sup>20</sup>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與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北京牛街志書—《岡志》修訂本》，頁 1~2。

亡，大清兵入關，驅民出城，居兩邊者失其所有，遂盡趨岡兒上，邇來時移世易，年久貧富變遷，向之茅舍零星者，今且煙火萬家矣。或訛稱曰「稿兒上」，亦曰「閣兒上」，此皆聲之轉也。

清朝時，回民聚居的情形以宣武區最為集中，牛街更成為著名的回族聚居區，其他如崇文區、朝陽區、西城區、東城區都有不少回族人口。而牛街回族聚居區在清朝則劃屬北京外右 4 區，轄 35 條胡同；民國時期屬北平市 11 區 15 保轄區；中共建政後，於一九五〇年屬北京市第 8 區。一九五四年，轄區設牛街、南半截胡同、棗林前街 3 個街道辦事處。一九五八年五月，合併為牛街街道辦事處。一九六〇年四月成立牛街人民公社，一九六八年成立牛街街道革命委員會，一九七九年恢復牛街街道辦事處迄今。<sup>21</sup>

## 2. 地理位置

北京市為中國的首都，下分為 16 個市轄區<sup>22</sup>與 2 個縣<sup>23</sup>，其中地處北京二環路以內的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這四個區是傳統上的內城區；規劃中北京市城區的範圍是北京市五環路（原公路一環）以內。北京市總面積為 1.68 萬平方公里，與整個台灣島的面積（35,759 平方公里）相比，約佔了台灣島的 47 % 左右，足見北京市的面積之廣。<sup>24</sup>

宣武區是首都北京的四個中心舊城區之一，透過北京市宣武區政府網頁資料得知，區內又分為「大柵欄街道辦事處」、「天橋街道辦事處」、「椿樹街道辦事處」、「陶然亭街道辦事處」、「廣內街道辦事處」、「牛街街道辦事處」、「白紙坊街道辦事處」與「廣外街道辦事處」等 8 個行政區劃。<sup>25</sup>（參見附圖一、二）

牛街回族社區（牛街街道辦事處）位於北京市宣武區的中部，東西長 2,067 公尺，南北寬 670 公尺，面積有 1.39 平方公里，東以菜市胡同為界，與「陶然亭街道辦事處」為鄰；南以南橫西街和棗林前街為界，與「白紙坊街道辦事處」相接；西以護城河為界，與「廣外街道辦事處」隔河相望；北以廣內大街為界，與「廣內辦事處」相接。回族集中居住在教子胡同以西，白廣路以東的牛街、輸入胡同、教子胡同、麻刀胡同、小寺街、牛街四條、糖房胡同與棗林斜街等 11 個居委管界內。<sup>26</sup>

<sup>21</sup>北京市牛街地區現狀調查組，〈北京市牛街地區現狀調研報告〉，收入中國都市人類學會秘書處編，《城市中的少數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年，頁 2。

<sup>22</sup>分別為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朝陽區、海淀區、豐台區、石景山區、門頭溝區、房山區、通州區、順義區、昌平區、大興區、懷柔區、平谷區等 16 個區。

<sup>23</sup>即為密雲縣、延慶縣 2 個縣。

<sup>24</sup>此百分比為筆者參考北京市政府與台灣地圖資料計算得出。

<sup>25</sup>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政府網頁，查詢日期：2006/4/3，<http://61.49.16.11/app/article/list1.asp?id=508>。

<sup>26</sup>良警宇，〈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論文，1999 年，頁 9。

### 3. 民族成分與人口

在二〇〇〇年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中，北京市總人口 13,569,194 人，北京市的回族人口有 235,837 人，其中宣武區為 27,668 人，占全北京市回族人口的 11.73%，<sup>27</sup>相對於北京市其他的少數民族人口，回族的人口比例仍算高，再由底下筆者所製的表格來看，選取了北京市中心的六個城區來做比較：

表一：北京回族人口占全市人口之比例<sup>28</sup>

	回族人口(人)	全部人口(人)	回族占全部人口比例(%)
北京市	235,837	13,569,194	1.74
(東城區)	15,035	535,558	2.81
(西城區)	18,202	706,691	2.58
(崇文區)	9,350	346,205	2.70
(宣武區)	27,668	526,132	5.26
(朝陽區)	50,185	2,289,756	2.19
(海淀區)	28,981	2,240,124	1.29

由上面的數據資料可知，雖然在北京市的朝陽區回族人口(50,185 人)跟海淀區回族人口(28,981 人)，比起宣武區(27,668 人)還多，但在朝陽區和海淀區的多民族散雜居情形明顯，回族的比例相對就要被沖淡許多，分別為 2.19% 和 1.29%，和宣武區的 5.26% 相比，足可見宣武區的回族聚居集中的分布狀態。

將範圍縮小到牛街，發現牛街回族社區是宣武區內回族更為集中的地區，轄區內居住著除了漢族，還有滿族、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苗族、壯族、布依族、朝鮮族、瑤族、哈薩克族、東鄉族、柯爾克孜族等 22 個少數民族，共有 54,331 人，其中以回族為主要的居民，約 12,561 人，占少數民族人口總數的 94.2%，占地區總人口的 23.1%。<sup>29</sup>

由上面的數據可以看出，牛街回族人口占宣武區回族人口的二分之一，可得知牛街回族社區是北京各城區中，回族人口最為集中之處，突顯出牛街回族的集居特色，由人口的數值更能看出牛街社區在中國城市回族聚居區所扮演的重要性。

<sup>27</sup>中國國家統計局人口和社會科技統計司、中國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經濟發展司編，《2000 年人口普查中國民族人口資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頁 4、5、640。百分比由筆者以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後計算得出。

<sup>28</sup>參考《2000 年人口普查中國民族人口資料》，頁 4、5、640；行政區劃網，查詢日期：2006/2/3，<http://www.xzqh.org/quhua/11bj/index.htm>。百分比由筆者以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後計算得出。

<sup>29</sup>北京市牛街地區現狀調查組，〈北京市牛街地區現狀調研報告〉，頁 3。

#### 4.行政區劃

從宣武區人民政府網頁中，牛街社區位於北京市西南隅宣武區轄界內一條南北走向的古老街道，是宣武區 8 個行政區劃（街道辦事處）之一，而牛街街道辦事處再細分為 9 個社區，分別為楓樺社區、法源寺社區、牛街東里社區、春風社區、牛街西里社區、白廣路社區、鋼院社區、南線閣社區、菜北社區。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居委會組織法》的規定，各社區建立了相應的居委會組織，負責本社區的日常管理和服務工作。<sup>30</sup>其中牛街東里社區、春風社區、牛街西里社區都是回族相對集中居住的地方。

從「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政府牛街街道辦事處」的網頁資料得知，該轄區內有水利部、國稅局、冶金部等 77 家中央單位，和北京鋼鐵設計研究總院、北京市殘疾人活動中心等 62 個中央市屬單位。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國家民委招待所等民族宗教機構也同樣設立在牛街回族社區當中。有各類企業 338 家，成人業餘大學 2 所、中學 3 所，例如有名的北京市回民學校、<sup>31</sup>小學 4 所、幼稚園 1 所，各類專業技能學校 5 所，社區醫院 3 家，大型商場和超市 9 座，其中京城黃金第一家菜百商場就座落在白廣路北口；座落在教子胡同的宣武圖書館每天接待大批讀者；位於廣安門附近的牛街民族敬老院更是北京市中心城內唯一一家具有少數民族特色的敬老院。<sup>32</sup>

---

<sup>30</sup>北京宣武區人民政府網，查詢日期：2006/4/3，「牛街街道概況」，<http://www.bjxw.gov.cn/XWjdx/XWnj/XWnjgk.ycs>。

<sup>31</sup>北京市回民學校是一所具有 80 年歷史的老校，在 1925 年 4 月 24 日建校，1949 年 10 月，學校的前身即為成達師範，並與西北中學、燕山中學合併，成為中共解放後第一所少數民族學校—「國立回民學院」。參見北京市回民學校網頁，查詢日期：2006/4/10，<http://xw.bjhmxx.com/show.aspx?id=479&cid=236>。

<sup>32</sup>同註 30。



## 第二節 牛街清真寺的創建與建築樣貌

### 一、牛街清真寺的興建沿革

北京牛街清真寺位於宣武區廣安門內牛街旁（附圖四），是北京市內規模最大、歷史最久的清真寺。一般來說，清真寺都設立在回族聚落區最爲中心且顯眼的位置，週邊的回族人口數量往往與清真寺修建的規模息息相關。今日所見的北京牛街清真寺之外觀與主體建築是在明朝，現存的大殿、碑文等建築，從碑文記載中，可證明在明正統七年（西元 1442 年）將對廳加以增修，作爲講經集會之需。

明成化十年（西元 1474 年）都指揮詹升爲牛街禮拜寺<sup>33</sup>題請名號，奉飭賜名爲「禮拜寺」，自此牛街禮拜寺成爲明朝四大官寺<sup>34</sup>之一，其宗教地位被確立。<sup>35</sup>此後，牛街清真寺在明朝王權的冊封之下，提高了宗教地位，明朝與牛街禮拜寺的冊封一事，請見本章第三節伊瑪目教制度。

明萬曆四十一年（西元 1613 年），牛街禮拜寺刻了「敕禮拜寺記碑」，記載了牛街禮拜寺的演進歷程；明崇禎十七年（西元 1644 年），清順治皇帝進入北京城後，牛街禮拜寺並無因爲戰爭的緣故而遭受破壞；清康熙十五年（西元 1676 年）牛街禮拜寺還進入了較大規模的修繕；康熙三十五年（西元 1696 年）又按原樣進行大規模修葺；民國十年（西元 1914 年）翻修了南北講堂，增設了大殿前南北穿廊，擴建了沐浴室，由於千年來多次對牛街禮拜寺進行修繕與擴建，逐漸形成了今日的規模；中共建政後，先後於一九五五年、一九七九年和一九九六年進行修繕工作。<sup>36</sup>

根據《新華網》內容與筆者的訪談得知，最近一次的整修在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開始動工，進行爲期八個月的工程，牛街禮拜寺大修工程共分兩期，一期主要對寺廟建築進行修繕，根據筆者的訪談得知此次修繕工程已被列入北京市「人文奧運文物保護計劃」，市政府總投資 500 萬元人民幣的經費，在不改變文物原狀、盡量保護文物的前提下，將全部文物建築進行維修保固，同時增加消防、避雷等安全設施，包括禮拜寺佔地 5,000 多平方公尺；二期工程主要是新建建築，包括在禮拜寺的東北角新建一座占地 1,000 多平方公尺的清真女寺，專供女穆斯林做禮拜使用，還有宣武區政府落實政策歸還的禮拜寺東院 3,100 平方公尺，供穆斯林學習、開會使用，竣工完成全寺的佔地面積擴大一倍，約有 9,200 平方公尺。<sup>37</sup>

<sup>33</sup>即爲牛街清真寺，因明朝正式賜名爲「禮拜寺」，故又有牛街禮拜寺之稱，在此特爲說明。

<sup>34</sup>分別爲東四清真寺、北京牛街禮拜寺、錦什坊街普壽寺、安內二條法明寺，被稱爲明朝京城的「四大官寺」。

<sup>35</sup>佟洵，《伊斯蘭教與北京清真寺文化》，頁 227。

<sup>36</sup>劉東聲、劉盛林，《北京牛街》，頁 140。

<sup>37</sup>新華網，查詢日期：2006/4/3，「牛街禮拜寺開工修繕」，[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4/21/content\\_2861298.htm](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4/21/content_2861298.htm)。

在明朝之前，關於牛街清真寺確切的創建時間，中國學者有著三種看法：

### 1. 遼聖宗統和十四年(北宋至道二年，西元 966 年)

潘夢陽先生在《伊斯蘭與穆斯林》一書中便提出它始建於遼朝，此說法的來源依據在於曾掛於清真寺內的一塊木質橫匾上所刻寫的《古教西來歷代建寺源流碑文總序略》的敘述，若從遼朝開始計算，牛街清真寺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在一九九六年時，寺內便以這說法舉行了建寺千年的慶祝活動。

此外，南京工業學院劉敦楨教授在鑑定清真寺內部藻井的彩繪，發現這是北宋工匠的技術手法，也可以作為是斷定年代的證據之一。<sup>38</sup>在《岡志》中也有提到：<sup>39</sup>

牛街禮拜寺肇於宋朝，有節海那速魯定奉飭所建立。緣宋太宗時，有節海革哇默定者，西域輔刺台人氏，來東土傳教，生有三子，長子節海賽德魯定，次子即節海那速魯定，三子節海撒阿都定。其異稟而有異能，性喜居避靜處，不幹仕進，上賜官爵，堅辭弗受，因授清真寺掌教，留居東土。後賽德魯定傳教遠出各方，不知所終。那速魯定與撒阿都定知燕京將為興隆之地，請飭建該禮拜寺於南郊，即牛街寺。

### 2. 元朝初期

劉盛林先生提出了清真寺始建年代於元朝初期，他發表在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選編》第 17 輯的《牛街禮拜寺始建年代考》，該文主要按地望分析而立論，認為牛街禮拜寺始建於元初（西元 1264 年）左右，從時間、地理、環境上是比較符合的。<sup>40</sup>此外在清真寺東南角內的兩座節海（*Shaihai*）<sup>41</sup>墳，其墓碑與節海墳的年代皆在元朝初期，西邊墳墓中的是穆罕默德·艾哈穆德·布爾塔尼，逝世於伊曆 679 年（西元 1280 年），東邊的是阿馬頓丁·阿里，逝世於伊曆 682 年（西元 1283 年），因此成為斷定牛街清真寺創建時間的證據。<sup>42</sup>但是元朝建立是在西元 1260 年間，所以不能說清真寺的建立是在元朝初期，而只能說使用的年代是在元朝而已。

<sup>38</sup>彭年編著，《北京的回族與伊斯蘭教史料匯編》，1996 年，頁 252。（內部刊物）

<sup>39</sup>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與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編，《北京牛街志書—《岡志》修訂本》，頁 59~60。

<sup>40</sup>劉東聲、劉盛林，《北京牛街》，頁 140。

<sup>41</sup>節海：指穆斯林對教內有名望的長者、教師、學者或有地位者的尊稱。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頁 614。文中的英文斜體字，筆者皆採用 Jianping Wang 在 *Glossary of Chinese Islamic Terms* 一書，使用大陸拼音標記中文發音的方式，來記述中國伊斯蘭教的經堂用語與專用詞彙。

<sup>42</sup>同註 40，頁 132~133。

### 3.明朝初期

姜立勛、富麗、羅志發三位學者在《北京的宗教》一書中，提出伊斯蘭教傳入北京地區始於元初這點是可以確立的，但牛街則否，起因他們不認為清真寺內的《古教西來歷代建寺源流碑文總序略》可作為證據，因此匾在 1950 年代已經殘破不全，經過文化大革命之後，更是找不到原件，今僅有北京圖書館所藏的舊時拓本與首都圖書館所藏 1950 年代劉仲泉手抄的副本，而副本因抄件時文字或有疏漏和異動，所以認為拓本是比較可信的資料。此外，他們也提到「匾文所述北京伊斯蘭教史書中，屬於明末清初者，堪稱時人記時事之實錄，足備史料……所謂牛街寺始建於宋，尤貽誤不淺。」<sup>43</sup>由上面兩者因素，再加上飾海墳與墓碑有可能是後世所仿建，因此他們認為北京牛街清真寺的創建年代應該是明朝初期。

## 二、清真寺建築與文物

下文所述的狀況為筆者在二〇〇四年七月前往北京牛街禮拜寺參訪所見，牛街西側正對禮拜寺大門前有一個很大的「影壁」，有著漢白玉的底座，灰色大方磚鑲面，長 40 公尺、高 5 公尺、厚 1.4 公尺，影壁中心正對「望月樓」，和「禮拜大殿」坐落在一條中軸線上。清真寺在牛街東側，入口設在大殿的後面，寺門以「望月樓」代替，只有在開齋節、古爾邦節時才開啓，平時從南便門進出，沿著南便門的通道進入，首先看到的是「滌慮處」，也就是穆斯林禮拜前作「大淨」(Dajing) 和「小淨」(Xiaojing)<sup>44</sup>之處，繼續向前穿過走廊，進入北院後便可以看到「禮拜大殿」，大殿位於清真寺的中心，為寺內的主體建築。

「禮拜大殿」總面積為 600 平方公尺，可容納近千人入內禮拜，位於大殿內部前方的龕式木雕經文閣(「米哈拉布」Mihalabu)，此為「阿訇」(Ahong)<sup>45</sup>領拜的地方，為寺內現存珍貴的宋代文物。另外，在清真寺東北跨院的「女禮拜殿」是供女穆斯林禮拜的場所。

「邦克樓」<sup>46</sup>在「禮拜大殿」的正前方，是清真寺宗教人員在禮拜前登上此樓向教民報告時間和召喚穆斯林作禮拜之用，所以又叫「宣禮樓」或「喚禮樓」，它的前身是宋元年間修建的「尊經閣」。

<sup>43</sup>姜立勛、富麗、羅志發，《北京的宗教》，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年，頁 177。

<sup>44</sup>大淨：伊斯蘭教的淨禮之一，原意為洗浴，沖洗全身，每逢聚禮、會禮、朝覲受戒及洗亡人前皆需洗大淨。小淨：伊斯蘭教的淨禮之一，即沖洗身體部分部位，一般在誦經、禮拜之前，清洗手、舉意、下半身、雙手、漱口、擤鼻、沖肘、洗臉，抹頭、耳和洗腳，均各三遍。參考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頁 121、613。

<sup>45</sup>阿訇：中國伊斯蘭教教職稱謂，意為教師、學者，也稱為「阿衡」、「阿洪」等。回族穆斯林對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務人員的稱呼，阿訇必須接受數年經堂教育並經考核合格後，舉行穿衣儀式，才能被正式承認。同上註，頁 13。

<sup>46</sup>邦克樓：伊斯蘭教清真寺群體建築的組成部分之一，意為尖塔、高塔，中國穆斯林稱為邦克樓。同上註，頁 369。

禮拜大殿兩側是南北講堂，北講堂名為「善慶堂」，作為阿訇的住處與講學教育的地方，至今仍保存帶有阿拉伯經文的古瓷器和手抄本、印經版的《古蘭經》，南講堂名為「闡一堂」，是清真寺管理委員會辦公的地方。

東大廳在邦克樓以東，俗稱七間房，又稱對廳，建於明正統七年（西元 1442 年），現為經書文物陳列室，也是接待賓客的場所。<sup>47</sup>禮拜寺的建築皆採用中國木結構的傳統形式，在主要建築物的細部裝飾上，也帶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裝飾風格，與一般中國的道教和佛教廟宇，有極為不同的差異。

除寺內建築物外，重要文物有位於寺內東南角的兩座「篩海墳」、一座高 2.7 公尺，上面有著中文撰寫「大清嘉慶三年秋月吉日建造」和阿拉伯文字體的鐵香爐、一個高 0.5 公尺，上鑄「道光丁未年有恒堂造重 150 斤」的銅香爐，和清乾隆四年（西元 1739 年）造的大銅鍋。<sup>48</sup>

在二〇〇五年七月，筆者再次前往參訪時，正巧遇上牛街禮拜寺的整修工程，故所有文物的位置是有所異動的，到處都是進行中的整修工程，例如：牛街禮拜寺因為修繕期間而無法在此進行宗教活動（附圖五），於是宣武區伊斯蘭教協會已在牛街南口的祥和家苑開闢了臨時的禮拜場所（附圖十四），供穆斯林進行宗教活動。

與前次相比，的確有種做到田野工作所需的「動態觀察」之感覺，此處的調查過程與筆者的觀察心得將於本論文第五章第一節作詳細的交代。二〇〇六年的牛街禮拜寺外觀變得更加金碧輝煌，而為了讓進寺的穆斯林在冬季能有溫暖的場地可以做禮拜，清真寺內用水、用電和文物防盜等相關設施也已進行改建或新建，成為牛街地區第一家用天然氣燒熱水和取暖的公共場所。

---

<sup>47</sup>佟洵，《伊斯蘭教與北京清真寺文化》，頁 222。

<sup>48</sup>參考劉東聲、劉盛林，《北京牛街》，頁 137。

### 第三節 掌教制度的轉變與寺坊制度的轉型

在伊斯蘭教設置的各類宗教職務人員，分工負責掌理各項宗教事務，其中負責全面領導和掌理宗教事務的就是「掌教」，即為一地區或寺坊的最高精神領袖。在伊斯蘭國家實行政教合一的體制中，掌教就是當地的宗教與政治領袖，但是在中國這套標準是無法適用的，因此伊斯蘭教出現了另一套宗教組織以適應中國國情的需要，掌教制度便孕育而生。

#### 一、掌教制度的演變

中國伊斯蘭教的掌教制度隨著朝代的推移而有不同的制度形成，筆者參考勉維霖主編的《中國回族伊斯蘭宗教制度概論》一書的說法，又另再加上中共建政後這段時間，可分為「卡迪（哈的）掌教制」、「伊瑪目掌教制」，後又逐漸演變成「阿訇掌教制」與「清真寺管理委員會制度」四個時期。

##### 1. 唐宋~元朝

唐宋時期，中國王朝會從穆斯林蕃坊中挑選精通《古蘭經》、《聖訓》與熟悉教律、教法的穆斯林一人，任命為「蕃長」，來管理蕃坊內的一切事務，稱為「卡迪」(Kadi)，<sup>49</sup>卡迪就是法官、判長之意。中國王朝給予卡迪能以伊斯蘭教法來進行對穆斯林之間的紛爭作判決與處置，他是蕃坊內的行政領袖也是宗教領袖。

元朝沿續了舊制，允許回回人依照伊斯蘭教法來處理內部事務，在中央設置「回回哈的司屬」，在回回人較多的地方設立「哈的所」，以「哈的」(Hadi)<sup>50</sup>作為掌教，稱為「回回掌教哈的」，依照伊斯蘭教法，管理穆斯林內部事務，哈的制略同於蕃坊。<sup>51</sup>

##### 2. 明朝~清朝末年

到了明朝，因為封建的敕封制度而更加強化了清真寺的權威，伊斯蘭教內的教職人員開始具有了掌教與行教的職權，成為寺坊內的宗教權威，原來清真寺內的伊瑪目便逐漸取代了哈的的職能，成為寺坊的掌教與最高宗教領袖。

「伊瑪目」(Yimamu, Imam)<sup>52</sup>是首席掌教，稱為大掌教，具有全部的宗教

<sup>49</sup>卡迪：伊斯蘭教教職稱謂，意為教法執行官，即依據伊斯蘭教法對穆斯林當事人之間的民事、刑事、商事等訴訟執行審判的官員。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頁 272。

<sup>50</sup>哈的即為卡迪之音轉，此為中文音譯的差異，其功能與職權皆相同。同上註，頁 187。

<sup>51</sup>勉維霖，《中國回族伊斯蘭宗教制度概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7 年，頁 174。

<sup>52</sup>伊瑪目：伊斯蘭教教職稱謂，意為領袖、表率，指清真寺內率領穆斯林舉行拜功的宗教人員，與中國清真寺的阿訇相同。同註 50，頁 660。

權利，率領教眾禮拜，主持公共性的宗教儀式與活動，為教坊穆斯林的最高宗教領袖；「海推布」(*Haitabu*)<sup>53</sup>稱為二掌教，協助伊瑪目處理教務，宣經講教，主持宣教儀式，誦讀「呼圖白」(*Hutubai*)<sup>54</sup>詞，司掌勸諫；「穆安津」(*Muanjing*)<sup>55</sup>為三掌教，專門宣禮，每到禮拜時刻，便專門召喚穆斯林進寺禮拜，宣布禮拜開始，此制度即為「三道掌教制」(*San dao zhang jiao zhi*)。<sup>56</sup>於是伊瑪目從一般的教職人員，轉化為教坊內的宗教領袖，又結合了中國的傳統思想，進一步形成了父死子繼的世襲掌教制度，此制度從明初到清末已延續了數百年，後被阿訇掌教制度所取代。

北京牛街禮拜寺在明末時，牛街回民曾向朝廷禮部保舉禮拜寺的掌教，請頒發「札副」、「冠帶」一事的一份呈請文書可以看出，北京的穆斯林寺坊，也曾實行世襲掌教制，世襲掌教是需要明朝王權批准任命，而為了保障其特權，也必須刻碑加以證明。牛街禮拜寺曾有明弘治九年和萬曆四十一年兩塊碑刻，記述了掌教的世襲罔替，永世不變。<sup>57</sup>

### 3.明朝中葉~民國時期

此制度興起的原因，就是父死子繼的世襲伊瑪目掌教制度，使得繼任人選的經學水準逐漸低落以及經堂教育的興起。

明朝中葉，伊斯蘭教經師胡登洲開辦經堂教育，培養出大批的阿訇，這些宗教人才則被各地教坊清真寺聘請，擔任清真寺經堂教師，設帳開學，講經佈道，阿訇成為了教坊與清真寺的中堅份子。

教坊與清真寺教權組織形式也逐漸發展成「掌教」與「掌學」兩套制度，掌教就是伊瑪目、海推布、穆安津三種教職人員仍繼續掌理教務；掌學則是由開學阿訇來負責宗教知識的教學工作，這兩種制度並行的狀態即為阿訇掌教制的過渡形式。

後來，開學阿訇的地位在教坊中日益重要，直到清末至民國時期，逐漸取代了掌教成為一坊的宗教領袖，確立了阿訇掌教制的形成。因為寺坊是一種宗教社團組織，教民具有信仰伊斯蘭教的一致性，在日常生活中發生的糾紛，往往由清真寺的掌教或其他公共人士依照《古蘭經》、《聖訓》等指示進行調解，若有重大刑事案件才會交給地方官府判決，這樣不僅提升了開學阿訇的宗教地位，也使違

<sup>53</sup>海推布：伊斯蘭教職稱謂，意為宣講教義者，是中國伊斯蘭教的三道掌教制中成員之一，多實行世襲制，明末，隨著三道掌教制的解體而消失，被阿訇、二阿訇或滿拉所取代。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頁 207。

<sup>54</sup>呼圖白：伊斯蘭教的宣教儀式，阿拉伯語音譯，意為宣講、演說，專指發表宣教演說。同上註，頁 222。

<sup>55</sup>穆安津：伊斯蘭教職稱謂，意為宣禮員，是中國伊斯蘭教的三道掌教制中成員之一，多實行世襲制，清代以來演變為義務制，現為清真寺學習的滿拉兼任。同上註，頁 379~380。

<sup>56</sup>參考良警宇，〈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頁 31；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三掌教制一辭條，頁 482~483；勉維霖，《中國回族伊斯蘭宗教制度概論》，頁 176。

<sup>57</sup>勉維霖，《中國回族伊斯蘭宗教制度概論》，頁 174。

規者在當地穆斯林與教坊人士的社會壓力下，不敢再犯，體現了寺坊對穆斯林的制約和管理作用。一般寺坊中的回民有困難時，就會前往清真寺找阿訇尋求幫助，在以往，若是家中有成員歸真，無力下葬時，家屬會到禮拜寺請求阿訇協助，只要阿訇下個指示，寺坊中許多穆斯林便會前往喪家幫忙打理一切事務，根本無需太過擔憂。自此以後，清真寺及宗教人員在社會中對於回族權利的維護，在在都強化了其在民間的權威地位。

歷史上有許多維護回民利益的行動都是由清真寺與其宗教領袖所發起並組織的，在《北京牛街》提到，一九九〇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美國軍隊駐紮在牛街一帶，並住在牛街清真寺內，當時的王浩然阿訇親自前往拜見八國聯軍統帥，說明聯軍軍隊不該影響回族生活與宗教信仰，打擾回民進寺作禮拜的功課，美軍因而撤出禮拜寺。同時，王浩然阿訇還召集了牛街回族中學武的青壯年男子，組織起來保護牛街一帶的商家與居民。<sup>58</sup>

牛街清真寺的王浩然阿訇於一九一二年創辦了「中國回族俱進會」，本部設於西單清真寺內，是北京最早的回族組織，該會參與了當時的民主政治活動，在全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各省市紛紛成立支會機構，本會與分會間相互聯繫，影響力遍及中國各地。<sup>59</sup>例如：南京綜合文藝刊物《南華文藝》上刊載了侮辱回族的兩篇文章，引起各地穆斯林的抗議，一九三二年「中國回族俱進會」和「北平回民公會」聯合召開了緊急會議，並推舉了牛街禮拜寺王瑞蘭阿訇等四名代表前往南京抗議，當時有 5,000 多位回民來送行，經過與南京的國民政府討論交涉後，同意加以查辦並維護回族的權益。代表回到北京時，有上萬名的回族前往車站迎接。<sup>60</sup>

除了創辦回族組織，王浩然阿訇也關注到回族的生計問題，發現許多婦女因為沒有學歷而無法工作謀生，便提出興辦工廠的主意，以自己的威望請出各方人士籌辦具有社會福利性質的「普慈毛巾工廠」，並請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每月批給紫老米 99 袋，以維持開辦時期的支出，這間工廠員工不分男女，皆可一同工作領取工資，成為當時的創舉。<sup>61</sup>

由《北京牛街》與〈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所提及到上述的幾個例子，不難窺見民國時期牛街清真寺阿訇對寺坊影響力之大，不僅保障回民生活權益與維護民族利益，也創辦回族組織，以清真寺為依託成立，展開許多反對民族歧視教案事件的活動抗爭。

阿訇掌教制的教權高度集中，集「掌教」、「掌學」和「宣教」於一身；以及阿訇的產生是實行聘任制，由地方鄉老和穆斯林共同討論之後，才決定聘請某位阿訇來當地清真寺掌教，阿訇聘任制與掌教權力高度集中是阿訇掌教制的兩個重要特點。

<sup>58</sup>劉東聲、劉盛林，《北京牛街》，頁 91。

<sup>59</sup>同上註，頁 89、94。

<sup>60</sup>良警宇，〈牛街：一個城市回民社區的形成與演變〉，頁 38。

<sup>61</sup>同註 59，頁 71。

#### 4.中共建政後~迄今

中共建政後，政府開始引導回族與伊斯蘭教的分離運動，回族過去族教不分的狀況開始逐步改變。一九五三年，曾與中國各地伊斯蘭教宗教人士一同創辦「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回族宗教人士楊靜仁先生，在一九五八年五月，提出了關於回族宗教問題的發言：<sup>62</sup>

要消除宗教制度中的封建殘餘與宗教特權，逐步使宗教在人民中真正成為個人的思想信仰問題，真正實現宗教信仰自由，為了達到這個要求，就要實行「五個分開」：一是「民族和宗教分開」，二是「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分開」，三是「宗教和行政分開」，四是「宗教和教育分開」，五是「黨內外分開」。

基於以上的論述，中共政權透過政府動員、團結宗教界的方式，對清真寺與宗教教職人員進行改造，清真寺的職能與宗教權利開始發生變化。

中國學者楊文炯在《傳統與現代性的殊相：人類學視閥下的西北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說到，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以往的寺坊管理制度被廢除，「清真寺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寺管會」）成為清真寺坊管理的新模式，底下設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委員數位，其主要成員由政府的宗教部門考察，大家推選而產生，主要負責寺坊內的所有職務，包括阿訇的選聘，這是中國當今寺坊管理制度的主要模式。<sup>63</sup>

《北京牛街》一書也說到，一九五一年八月一日，牛街禮拜寺首先改革了清真寺管理制度，成立「民族管理委員會」，對寺內事務進行管理。一九五三年，位於牛街社區的「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正式成立，一些有代表性的阿訇分別被安排為市、區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以協助政府貫徹民族與宗教工作。一九五八年宗教制度改革在中國全面實施後，「北京市伊斯蘭教界學習委員會」成立，廢除了世襲的「伊瑪目掌教制」和「阿訇掌教制」，清真寺開始實行民主管理，阿訇等宗教人才由「中國伊斯蘭經學院」加以培養，待學業完成後分發到中國各地擔任清真寺內阿訇職務。<sup>64</sup>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宣武區召開第一次「伊斯蘭代表大會」，「宣武區伊斯蘭教協會」宣告成立。在「宣武區伊斯蘭教協會」成立初期，牛街禮拜寺由「北京市伊斯蘭教協會」和宣武區政府雙重領導，一九八八年，經與宣武區民族宗教辦公室協商，由北京市宗教處批准，成立了「牛街禮拜寺管理組」，自一九九〇年四月，牛街禮拜寺歸於「宣武區伊斯蘭教協會」直接管理，其寺務管理、經濟管理等制度遵循「宣武區伊斯蘭教協會」制定的規章制

<sup>62</sup>黃光學主編，《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上集》，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頁117。

<sup>63</sup>楊文炯，《傳統與現代性的殊相：人類學視閥下的西北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頁270。

<sup>64</sup>劉東聲、劉盛林，《北京牛街》，頁47。



度。<sup>65</sup>

中共政權以團結宗教界人士組成伊斯蘭教協會、政協、寺管會等組織的方式，透過一連串實際由政府主導的組織型態，讓中國穆斯林社會自唐宋以來形成的掌教制度逐漸瓦解，落實宗教不干涉政治的原則。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宗教迫害，對具有宗教色彩或是宗教干涉政治的活動極為敏感，並全力阻止，這樣的狀況，在改革開放後，中共政權的宗教政策逐步放寬，開始注重中國境內各宗教活動，立法保障穆斯林的宗教權益，但中共政權的宗教政策之基本精神仍舊不變，也就是「宗教與民族分離政策」，這讓清真寺的社區政治中心角色已逐漸成為歷史的一部分，清真寺的掌教制度對於社區的權威作用被徹底消除。

關於現在清真寺內阿訇的工作內容，筆者訪談了牛街清真寺的楊東文阿訇，他說到：<sup>66</sup>

阿訇的工作內容：阿訇就是伊瑪目（老師之意，傳道授業解惑）、禮拜、講臥爾茲，與宗教生活的項目等，分為寺內跟寺外的兩種項目。工作差不多是終身制度，而非三年一聘，工作時間類似上班族，若有民眾找，一樣可以找到我，（等牛街禮拜寺整修完工）之後搬回清真寺內繼續工作。目前北京各寺坊間宗教人員彼此的交流機會不多。

民眾若要找阿訇幫忙則多在樓下（臨時辦公室），若較熟悉者便會上樓（樓上為阿訇的辦公與休息之處）請教，或是在辦公室登記預約阿訇的時間，目前寺內有十位阿訇，寺內有位較年長的阿訇則是負責政治事務。

由楊阿訇的說法不難看出，現在牛街清真寺內的阿訇其宗教權力與民國時期王浩然阿訇相較，感覺更像是上班族一樣，阿訇在清真寺內等候回族居民的諮詢，或是到各地參加回族居民的婚喪喜慶，相較起來，宗教權力的光環消失很多。

## 二、寺坊制度的轉型

上文所述及到的「蕃坊」、「回族聚居區」、「社區」等詞彙，對中國的回族而言，其實只是對「寺坊」在不同歷史時代下的不同稱呼而已。

回族對以清真寺為中心的聚居區型態稱之為「Jamaat」，阿拉伯文的意義是「聚集、集體、團結、共同體」，中文音譯為「哲瑪爾提」，它不是漢語中的外來詞彙，而是基於伊斯蘭文化的母語，這是回族的共同用語。<sup>67</sup>寺坊（又稱為教坊、坊）即為中國穆斯林圍著一個清真寺為中心的聚居區，通常清真寺和聚居區都是一對

<sup>65</sup>同上註，頁 56~57。

<sup>66</sup>經筆者在 2005 年 7 月 12 日前往北京牛街清真寺辦公室，訪談楊東文阿訇整理的訪談內容。

<sup>67</sup>楊文炯，《傳統與現代性的殊相：人類學視閥下的西北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頁 184。

一的分布狀態，極少有一個聚居區內有許多清真寺的例子。<sup>68</sup>寺坊沒有明確的邊界，每個寺坊自成一格，各寺坊間互不隸屬，也非政府規劃的行政單位，不具有任何獨立或自治的性質。

寺坊是回族社會基層的宗教社區，除具有普通社區的特徵外，也是以伊斯蘭教文化為連結的社區，清真寺是為寺坊的核心部分，不僅是社區穆斯林進行禮拜與宗教活動的場所，也是傳承回族文化，教育下一代回民的中心，所以寺坊內的穆斯林生活也和清真寺有著十分緊密的關係。以「清真寺—寺坊」文化結構組成的回族社區是回族在「大分散、小集中」中保持本民族群體傳承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

在社會學的社區研究中，一般比較強調社區的地理邊界，對回族寺坊來說，文化邊界則更為重要，回族寺坊的獨特文化內涵又可能使社區打破地理界線，具有地理上的廣延性和文化上的內斂性，這是回族寺坊有別於一般社區的重要特點。<sup>69</sup>

在都市社區中，寺坊制度的文化邊界更加重要。在城市中，回族的地理邊界往往是不存在的，不如回族聚居區明顯，由於多民族散雜居的程度高，回族人口比例變少。人際關係上的非親屬關係（鄰里關係），反而比起血緣關係更加重要。在這種環境中，回族的社區往往只能依靠文化與教育的方式來維持其延續和獨立性，通過寺坊制，中國的回族社區得以整合，秩序得以建立。自宋以來，北京回族聚落區幾經變遷，直至一九四九年以前為止，寺坊制度仍舊存在。

筆者參考中國學者馬宗保對於「寺坊」的說法，列舉寺坊制度的功能：<sup>70</sup>

## 1. 宗教生活的體現

回族本身是一個由多民族組成的群體，經由歷史的發展逐漸成為今日的樣貌，其中最大的凝聚因素就是伊斯蘭教與寺坊制度所形成的紐帶關係，寺坊的回民依照《古蘭經》的教法與規範進行日常作息，展現了穆斯林生活的民族風貌，也作為區分以漢語為溝通用語的漢族與回族之清楚標誌。

按照回族的傳統，穆斯林的婚喪嫁娶都要到清真寺舉行宗教儀式，新人結婚要請阿訇替新人舉行結婚儀式（尼卡哈，*Nikahan*），<sup>71</sup>念經祈福，婚禮以前大多在清真寺內舉行，根據筆者在二〇〇五年七月訪問牛街回族楊學功先生得知，目前牛街回族的婚禮多改為在家中或是附近的清真餐廳舉行。

根據筆者在二〇〇五年七月訪問牛街回族B先生得知，在穆斯林喪葬儀式方

<sup>68</sup>金宜久，〈伊斯蘭教小辭典〉，上海：上海詞書出版社，2001年，頁379。

<sup>69</sup>周傳斌、馬雪峰，〈都市回族社會結構的範式問題探討—以北京回族社區的結構變遷為例〉，《回族研究》，2004年第3期，頁35。

<sup>70</sup>參考馬宗保，〈試論回族社會的「坊」〉，《寧夏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頁20~22。

<sup>71</sup>尼卡哈：伊斯蘭教的婚姻儀式，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頁423。

面，之前大多在牛街清真寺內進行，望月樓下的兩座亭子間就是為停放亡人進行殯禮沖洗的地方，一整套的殯禮就是穆斯林歸真後，清真寺要為亡者提供清洗的工作，並以克凡(*kefan*)<sup>72</sup>加以包裹，由親友與自院前來送行的穆斯林抬往墳地，阿訇也要替死者舉行者那則(*Zhenaze*)<sup>73</sup>的喪葬儀式，並書寫護胸和圍坑布上的經文等等。如今，牛街地區的殯禮大多改在回民殯葬所或是自己家中舉行。<sup>74</sup>

食用的雞鴨禽畜都要請阿訇幫忙屠宰，在古爾邦節<sup>75</sup>當天，穆斯林也會集資購買牛羊，牽到清真寺請阿訇下刀，並將剛剛宰殺的牛羊洗淨後，割成小塊，由眾人帶回家中食用。但這點在訪談了清真寺的楊東文阿訇，他說目前牛街清真寺的阿訇，已經不用替民眾宰殺牛羊了。<sup>76</sup>

### 2.文化傳承

民族文化要能保存勢必得透過教育的方式，才能使下一代明瞭其文化特色與內涵，回族文化的傳承則是利用寺坊制度的教育功能實現。

自明朝伊斯蘭教經師胡登州開辦經堂教育後，回族逐步形成了一套完善的伊斯蘭文化教育制度，從此回民教育進入了新的一頁，經堂教育不另設學校，學童是直接到清真寺內學習，清真寺變成了寺坊中回民教育的場所。

經堂教育分為小學、中學、大學，小學遍設於各清真寺內，對於回族學童進行啓蒙教育，從小學習宗教知識與生活禮儀，讓伊斯蘭的觀念深植在每個穆斯林心中，成年後，透過中學教育以及參與清真寺的宗教活動等方式，將能使穆斯林更理解伊斯蘭教的基本知識，遵守伊斯蘭教法的規範。經堂大學則是培養專門的宗教人才，學成後成為主持清真寺事務與宗教活動的人選。<sup>77</sup>

寺坊制度透過宗教文化的傳承，加以家庭教門的要求與參與宗教節日的慶典活動等方式，讓寺坊內的穆斯林從小便有對伊斯蘭教的宗教信仰與回族身分的認同意識。

### 3.群體保護

透過圍繞著清真寺而聚居的型態，使得寺坊內的居民有著在生活層面與精神層面的安全感，一旦遇到有外來勢力介入，影響其生活穩定時，寺坊內的回族也會群起加以抵抗與反制，或是某寺坊遭受攻擊或迫害時，本著天下回回是一家人與四海穆斯林皆兄弟的心情，其他鄰近的寺坊回族也會趕來相互支援，群起串

<sup>72</sup>克凡：伊斯蘭教喪葬禮制用品，意為裹屍布，為穆斯林土葬包裹亡人的白色棉布屍衣。同上註，頁 293。

<sup>73</sup>者那則：伊斯蘭教殯禮儀式，參站者那則的人，除表示為死者拜主脫塵歸淨，祈求真主寬恕亡者的罪過外，也教育活人不忘敬畏真主，履行宗教功課。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頁 736~737。

<sup>74</sup>此段資料為筆者於 2005 年 7 月 2 日前往北京牛街清真寺訪談 B 先生所整理之內容。

<sup>75</sup>古爾邦節：伊斯蘭教主要節日之一，亦稱宰牲節，古爾邦為獻祭和獻性的意思，為朝覲功課的主要儀式之一時間為伊斯蘭教曆 12 月 10 日，為朝覲期間的最後一天。同註 72，頁 724。

<sup>76</sup>經筆者在 2005 年 7 月 12 日前往北京牛街清真寺辦公室，訪談楊東文阿訇整理的訪談內容。

<sup>77</sup>參考馬宗保，〈試論回族社會的「坊」〉，頁 20~22。

聯，例如本文第一章第三節所提到的《性風俗》事件、《腦筋急轉彎》侮教案件就是寺坊回族彼此支援很好的例證。

#### 4. 社會規範

透過寺坊內阿訇與教務人士的宗教調解、回民群體內部的風俗禮儀、價值標準和道德規範等方式，對寺坊居民的行為和觀念有所約束，使其依附於傳統的行為模式，以維持寺坊的生活秩序與穩定內部的人際關係。可以說回族居民在生活中，受到兩種力量的制約，其一來自於政府體制下的法律規定，另一個便是伊斯蘭教法與寺坊制度的規範。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遷，寺坊制度的社會規範功能正在逐步弱化，也因此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

一九五八年的極「左」路線乃至「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極端民族宗教的迫害，清真寺關閉、拆毀，宗教被否定，教職人員受到批判，經堂教育長達二十年的中斷，造成了回族文化的巨大斷層，再加上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回族教育被納入國民教育體系中，宗教和民族文化教育的普遍缺失成爲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sup>78</sup>當一九八〇年代，清真寺恢復重建後，阿訇等師資的缺乏成了一大隱憂，於是中國各地紛紛興起了傳統經堂教育的復興現象，蘭州市的各清真寺開始大量招收滿拉（*Manla*），<sup>79</sup>少則 4~5 人，多則 40~50 人；中阿學校、阿語學校紛紛興起，<sup>80</sup>這就成爲發展與傳承回族文化的另一種形式了。

不難發現，由於中共政權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對伊斯蘭教的宗教迫害與之後實行的「宗教與教育分開政策」，使得回族的伊斯蘭文化傳承出現極大的斷層，這從現今中國各地清真寺極力恢復經堂教育和阿拉伯語教學課程的現象，即可知道穆斯林對於文化傳承的重視性，關於牛街社區的學習班狀況，將於本文第六章第二節加以討論。

除了清真寺內的宗教教育停止之外，在「寺坊制度」上，中共政權也透過兩套機制來掌控，一是成立「清真寺管理委員會」，讓穆斯林自行組成，並自行選聘阿訇來講學，清真寺的寺產不再爲清真寺所有，而由寺管會來掌控，表面上是由穆斯林自主，但寺管會的上層組織則是各級政府體制下的伊協與政協各單位，實際的掌控權力的還是政府單位；二是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成立的「街道辦事處」與「居民委員會」這兩個都市社區的地方組織取代「寺坊制度」，由群眾自治的方式來管理社區內部的相關事務，這是中共建政後在各地推廣的行政區劃，大幅地改變了回族寺坊制度的地理範圍。

<sup>78</sup>周傳斌、馬雪峰，〈都市回族社會結構的範式問題探討-以北京回族社區的結構變遷為例〉，頁 37。

<sup>79</sup>滿拉：中國伊斯蘭教清真寺經堂學員的稱謂。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頁 724。

<sup>80</sup>楊文炯，《傳統與現代性的殊相-人類學視閥下的西北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頁 273。

清真寺的楊東文阿訇說到：<sup>81</sup>

倘若（牛街地區）有回漢（居民）衝突時，不是由阿訇處理，而是由（牛街街道）辦事處來接洽。

由上文楊阿訇的說法與中共政權推行的兩套宗教與行政制度得知，「寺坊制度」正在逐漸弱化與解構中，要如何重建與保存其功能，或是如何改造它成爲一個符合現今中國國情的「新寺坊制度」，便成爲當代研究回族社區的學者們一個極爲重要的問題。

下文即將談到的城市改建計畫，這將對於中國回族寺坊制度的崩解速度有著極大的影響力，讓牛街回族社區千年來原本以回族爲主的封閉聚居形態轉變爲開放型的社區，這對於回族本身的生活型態有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

<sup>81</sup>經筆者在 2005 年 7 月 12 日前往北京牛街清真寺辦公室，訪談楊東文阿訇整理的訪談內容。

## 第四節 危改計畫對社區回族居民的影響

本文所稱的「危改計畫」是指北京市宣武區政府針對區內危險陳舊的房屋改造，與重新整頓市容、補強公共建設的計畫，它對於都市社區回族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使得具有千年歷史的牛街回族社區有著極大的改變。

### 一、危改計畫興起的原因

對於北京市各城區而言，位於西南角的宣武區屬於北京的老城區，根據二〇〇五年的統計資料來看，宣武區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 3.3 萬人，平均一個人住房使用面積只有 14.54 平方公尺（北京市城鎮居民則是 19 平方公尺），<sup>82</sup>人口密度居於北京四城區的最高者，該區地域狹小，人口稠密，危險陳舊的房屋很多，市政基礎設施條件相對落後，制約了宣武區優勢的發揮，阻礙了其經濟的發展，這是一般北京市民所共知的。相對北京市內各城區而言，宣武區相對要貧窮些，但也有它自身的優勢，宣武區歷史悠久，文化底蘊豐富，擁有大柵欄、琉璃廠等商業和文化區域，百年以上的老字號和名勝古蹟雲集，為發展文化旅遊業、商業、服務業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基礎。

推動宣武區實施危改計畫的主因是為適應北京國際大都市建設的需要，配合首都的整體規劃要求，北京市的基本功能定位是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市內各項事業的發展都要充分作到這一要求。作為北京的中心城區，城市建設與發展必須要迎頭趕上已較為富裕進步的東城區、西城區、朝陽區、海淀區，除此之外，也必須改善區內民眾的生活需求，也就是危房的問題，宣武區共有平房 269 萬平方公尺，其中危房占 53.5%，居住環境得不到根本改善。一些地區被居民生動地稱之為「三級跳」，即：馬路比院子高，院子比房屋地面高，進院子要下臺階，還要跨越「擋水板」，基本的日常生活根本是苦不堪言。

二〇〇五年宣武區人民政府所作 1% 的抽樣調查中，牛街街道的常住人口<sup>83</sup>有 5.6 萬人。<sup>84</sup>由筆者前往牛街的訪談過程得知，因為歷史悠久，居住在此的居民大多住在從明清一代就有的平房當中，許多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一同擠在 10 平方公尺的屋子裡，其房屋年久失修，低矮破舊，結構簡陋，室內潮濕陰暗，如遇到大雨，則到處漏水，一到夏天，待在沒有空調的家裡，炙熱難耐，到了冬天大雪紛飛，室內也沒有暖氣，屋子裡凍得只能不停地燒爐火，生活機能不完善。除牛街外，大多數胡同道路狹窄崎嶇，高低不平，加上天氣不穩定，燒火做飯時，

<sup>82</sup>《宣武報》，2005 年 6 月 28 日，第三版「我區近期啓動三項拆遷工程—努力改善人居環境」。

<sup>83</sup>常住人口是指居住在本區、戶口登記地在本區的人，以及居住在本區、戶口登記地在本市外區縣或外省市、但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

<sup>84</sup>北京市宣武區政府網，查詢日期：2006/3/30，「宣武區 2005 年 1% 人口抽樣調查主要資料公報」，<http://www.bjxw.gov.cn/XWIndex/XWxxxsh.ycs?GUID=369086>。

總是煙霧瀰漫，生活品質不佳。房屋沒有廁所，若有需要得要到胡同裡或是街上公廁解決，早晚都需要排隊。牛街的市政設施陳舊且缺乏，全院公用一個水表和電表的狀況十分普遍，電線的電壓負荷小，無法使用冷暖氣的空調、電視、電冰箱等電器設備。

這在筆者前往牛街訪談楊學功先生時，他所做的「順口溜」(節錄)可見危改計畫前牛街回族生活的狀況：<sup>85</sup>

曾記得，舊時的牛街嗎？當時馬路只有七公尺寬，而且凹凸不平，坑坑窪窪，又是泥又是土，堆滿路崖。行人、車輛渾行於此，交通擁擠，事故頻發。那真是刮風一街土，下雨兩腿是泥巴。路兩邊，用小石塊堆砌的四合院內，房屋破舊低矮，缺磚少瓦。

冬天凜冽的北風，吹得房內缸裡的水，凍成冰疙瘩。人們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上牙打下牙。夏季，驕陽似火，院小、房矮，人們無處藏，無處躲，時不時地冒出幾句京罵。

下雨時更糟啦，屋外天下，屋內小下，屋外不下，屋內還下。整個屋裡，讓人喘不上來氣，常常把痰咳。此時你會聽到老人們的呼聲：“主哇，安拉胡的主哇”“救救我們這些虔誠的穆斯林吧！”

此刻我的淚水悄悄在腮邊掛，又苦又濕，又酸又辣，是呀！什麼時候，我們才能住上冬不怕風，夏不怕雨的新房啊！

終於在市、區各級政府的關心和領導下，在辦事處、居委會各級領導，和全體居民共同努力下，牛街變啦！！

從前窄小不平的小馬路，現在變成長 670 公尺，寬 40 公尺的陽光大道，行人、自行車各行其線，機動車可以兩上、兩下。

從前低矮、破舊、透風、漏雨的小屋，現在變成帶有民族特色的幢幢樓房，高大挺拔。室內空氣流通，面積廣大，讓人感覺，既清新又豁達。家家都安上了，冰箱、彩電、空調、電腦、手機和電話。人們再也不怕，嚴寒的冬天與燥熱的枯夏。

---

<sup>85</sup>該順口溜是筆者於 2005 年 7 月 2 日前往北京牛街西里二區田野調查時，訪問楊學功先生（北京牛街回族居民）時，徵得楊先生的同意，收錄於論文中。楊先生現已退休在家，閒時會做詩自娛娛人，其作品多次發表於牛街街道辦事處發行的《今日牛街》新聞及各刊物，作品極為生動俏皮，可以真實地反映出牛街回族的生活樣貌與心情寫照。

## 二、北京市的危改計畫簡介

### (一) 宣武區的大規模危改計畫，分為兩個階段

#### 1. 一九九〇至二〇〇〇年

全北京市大規模的危舊房改造始於一九九〇年至二〇〇〇年，全市累計開工改造危舊小區 168 片，竣工 53 片，竣工面積 1,450 萬平方公尺。拆除危舊房屋 499 萬平方公尺，動遷居民 18.4 萬戶，累計完成投資 469 億元人民幣。<sup>86</sup>但隨著危改計畫逐步向城中心區發展，由於舊城區人口密度大，市政條件差，規劃限制相對較嚴，危改工作難度加大。

宣武區政府為了改善區內的狀況，決定開始實施危改計畫，改善投資環境，美化市容環境，藉以吸引更多外地的投資，共同繁榮宣武區的經濟發展。

在《北京青年報》中，宣武區區長唐大生<sup>87</sup>提出「城建帶動戰略」，就是以一九九九年在《宣武區國民經濟和發展五年（1999—2003 年）規劃綱要》中正式提出的方案，具體來說，宣武區的「城建帶動戰略」，是指政府通過增加財政資金收入，以及運用市場機制引導和鼓勵社會資金，參與危房改造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重新塑造宣武區的城市環境，以此帶動區內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sup>88</sup>廣安大街的改造和擴建、菜市口大街的建成和通車，宣外大街等道路改造工程的順利進行，促使了交通的便利性。宣武區的危舊房屋改造計畫有了重大進展，牛街、平淵里等危改小區的開發建設，使世代居住在危舊房屋裡的老百姓，終於有了嶄新的生活環境。

#### 2. 二〇〇〇年~迄今

二〇〇〇年以來，賈慶林書記、劉淇市長多次到牛街危改區視察，明確指示官員們要研究危改計畫的新方向，加快危改工作的進行。在「京報網」中，「提到北京市政府組織有關部門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貫徹落實中國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精神，提出了以『房改帶動危改』的新方式，並於二〇〇〇年三月經市委、市政府批准印發了《北京市加快城市危舊房改造實施辦法（試行）》，在崇文、宣武、豐台三個區分別選取了龍潭西里、金魚池、天橋、牛街二期、右外西莊三條等 5 片危房區，進行「房改帶動危改」的實施地點，此為宣武區政府大規模危改中的『三區五片』。這五個地區總佔地 97.3 公頃，總建築面積 135 萬平方公尺，需動遷居民 1.4 萬戶，拆除危舊房屋 53.4 萬平方公尺，總投資約 50 億元。」<sup>89</sup>其中牛街二期的工程內容將在下

<sup>86</sup>《北京青年報》(2001 年 8 月 9 日)，查詢日期：2006/4/3，「北京危舊房十年拆了 499 萬平方米」，<http://house.big5.enorth.com.cn/system/2001/08/09/000111877.shtml>。

<sup>87</sup>唐區長當時在宣武區實施「城建帶動戰略」，啟動了「十五」計畫。

<sup>88</sup>《北京青年報》(2000 年 12 月 21 日)，查詢日期：2006/4/3，「實施“城建帶動戰略” 宣武區明天更美好」，<http://www.bjyouth.com.cn/Bjqnzz/20001221/BIG5/285%5ESZ1204.htm>。

<sup>89</sup>京報網 (2001 年 7 月 3 日)，查詢日期：2006/2/13，「本市新啟動危改小區 21 片」，



文做詳細的說明。

在二〇〇一年八月九日的《北京青年報》中也提到：「二〇〇一年『房改帶危改』已正式啓動 12 片，包括東城區的海運倉、交東大街；西城區小市口、德外；崇文區東花市南里、金魚池；宣武區天橋、牛街、槐柏樹街 11 號院、新安中里；豐台區右外西莊三條、豐台鎮簡易樓等。爲進一步推進危舊房改造工作，北京市市政府在中共政權的「十五」期間要極力完成北京城區 303 萬平方公尺危房改造任務，其中二〇〇一年計劃實施 130 片（其中新開工 52 片），拆除危房 82 萬平方公尺，動遷居民 6.7 萬戶。」<sup>90</sup>

二〇〇一年八月九日的《北京青年報》一文中，關於北京市政府積極探索危改的新方法，有以下五種模式：「一是以房地產開發帶動危改。二是以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帶動危改。三是由政府出資、區房管部門運作，採取維修或翻建方式，對房管系統的直管公房進行改造。四是建立危改住宅合作社來完成危改。五是以文物保護帶動危改。通過申請文物保護專項基金，對文物保護區範圍內的一些文物古蹟周邊環境進行整治，搬遷保護範圍內的單位和居民，對文物建築進行保護性修建。」<sup>91</sup>

《宣武報》在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八日的報導提到：「從一九九〇年開始大力推動的危舊房改造計畫，建成了天橋、牛街等 22 個危改小區，改善了近七萬戶居民的住房條件，二〇〇五年宣武區正在進行與尚未進行中的危改小區還有 16 個，包括報國寺、大吉、廣安、宣西、臘竹、菜市口西、留學路、大柵欄等地，仍有 5.8 萬戶居民住在低矮危舊平房之內」，<sup>92</sup>因此北京市宣武區的危改計畫仍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

危改計畫從一開始的大面積的改造，演變成小規模、漸進式、多樣化的方式進行，透過「城中村」整治、市政到路建設、危房危樓拆除與文物保存修護等多種形式，採用了嶄新的城市規劃與危改計畫，解決居民住房的困難，也可使得宣武區煥然一新。

## （二）牛街地區危改計畫可分爲三個階段

### 1. 嘗試期

牛街社區是東亞伊斯蘭國家到中國舉行宗教活動的首選地之一，經常在此舉行宗教儀式，有許多國際穆斯林與政府官員到此禮拜與參訪，因此北京市政府決心將牛街地區劃入危改的重點工程之內。根據「北京市牛街地區現狀調查組」的資料中，一九九〇年北京市剛開始進行危改時，牛街回族最爲集中居住的春風小區即被確定爲首批危改工程之一，從一九九〇年十一月開始動遷，到隔年的十一

---

<http://bjrd.beijing.gov.cn/Resource/Detail.asp?ResourceID=35471>。

<sup>90</sup> 《北京青年報》（2001 年 8 月 9 日），查詢日期：2006/1/23，「北京危舊房十年拆了 499 萬平方米」，<http://house.big5.enorth.com.cn/system/2001/08/09/000111877.shtml>。

<sup>91</sup> 同上註。

<sup>92</sup> 《宣武報》，2005 年 6 月 28 日，第三版「我區近期啓動三項拆遷工程—努力改善人居環境」。

月就可以遷回，當時七棟樓建好後，70%的居民都是回族，回遷的房價極為優惠，當初的拆遷公司（區宣建公司）負擔大部分的金額，賠了 3,000 多萬元人民幣，<sup>93</sup>居民所付的費用相對較少，這種形式的危改基本上沒有涉及住房制度的改革，純粹是政府行為，對於居民是極為有利的政策，但對於區政府的財政是極為沉重的負擔，有鑒於先前在春風社區的案例，龍鳳里危改小區與南線里危改小區的危改則是和房改同時進行，回遷的居民都必須花錢購買新居，而房屋的產權則歸居民所有。上述三個小區的危改計畫，回遷率都在 90%以上，也因此促使宣武區政府決定繼續進行更大規模的拆遷工作。

## 2.第一期工程

根據「北京市牛街地區現狀調查組」的資料中，在牛街危改的前期，由於工程浩大，居民的回遷率高，許多的建築限制都需要大量資金，再加上危改計畫必須考慮到讓大多數的牛街回族居民回遷，許多開發公司受限於這些要求，經過評估後發現不但無法賺錢，甚或還可能賠錢，最後宣武區政府投資了 4,000 萬元人民幣，由自己的房地產公司（宣武區房地產經營開發總公司）在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開始接管區內危改計畫的開發案，而方案則在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正式批准，十月十六日拆遷許可證辦理完成。<sup>94</sup>由上文可知，牛街的危改計畫在初期，是由政府機構所主導，一開始主要是為了改善回族居民的居住問題，而非商業利益的考量。

於是從一九九七年，牛街便開始了大規模的第一期危改計畫，牛街危改區東起教子胡同，西至白廣路，南起到輸入胡同、牛街四條，北至廣內大街，分為東、西兩個小區，<sup>95</sup>占地 35.9 公頃，可規劃用地 26.99 公頃，市政代徵地 6.5 公頃。（附圖三）

初步統計需動遷居民 7,500 戶，共 2.6 萬人，其中回民戶和民族團結戶占其中一半，涉及拆遷企業有 175 個，共拆遷危舊房屋 25 萬平方公尺，牛街是北京市著名的少數民族居住區，回族居民占居住人口 50%以上。<sup>96</sup>一九九八年四月牛街危改一期工程動工，二〇〇〇年底，第一期工程已建成 14 棟塔樓和 1 棟多層樓，3,500 戶居民中 97%回遷。<sup>97</sup>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七日，是牛街危改小區第一期工程竣工，部分回族居民回遷新居，這天也是賈慶林先生第七次前往牛街，參加了牛街居民的回遷儀式，當天還有劉淇市長以及李志堅等官員，親手把新房的鑰匙交給了回遷的居民。<sup>98</sup>

<sup>93</sup>北京市牛街地區現狀調查組，〈牛街危改〉，頁 22。

<sup>94</sup>同上註，頁 23。

<sup>95</sup>楊青，〈從居住環境的變化看民族凝聚力〉，《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年 2 第 6 期，頁 25。

<sup>96</sup>同註 93，頁 25。

<sup>97</sup>焦點別墅網（2001 年 4 月 17 日），查詢時間：2006/4/3，「北京“三區五片”危改試點加快全市危改進程」，<http://villa.focus.cn/newsthtml/15693.html>。

<sup>98</sup>《民族團結雜誌》網頁，查詢日期：2006/2/19，「賈慶林七到牛街」，

牛街危改計畫是以牛街清真寺為中心，向四周放射性地興建逐步增高的建築，北端臨廣安門內大街的規劃高度為 60 到 65 公尺，東側與西側臨牛街的大型公共建設則在 50 到 55 公尺，南邊則是為 50 公尺。<sup>99</sup>

由於牛街是伊斯蘭教宗教活動的重要聚集區，為了配合伊斯蘭教文化，筆者在田調過程發現，新建成的牛街民族團結小區的建築樓房外型設計採用了伊斯蘭教風格的樣式，這從大樓的窗框設計與樓房頂部皆為帶有阿拉伯風格的穹頂形狀可見一斑（附圖六、七），突顯了回族社區的民族特色，每棟樓都有水、電、暖氣、電話線、有線電視管線與寬頻網路線都一應俱全，樓前的空地也鋪設了草坪，設有座椅跟健身器材，社區內也有物業服務部、停車場、販賣部、回民醫院開設的社區門診部、婚姻介紹所等等。

牛街本身就是貫通社區南北的主要幹道，原先只有 7.2 公尺寬（附圖八），於二〇〇二年五月中旬竣工通車，總投資 1.8 億人民幣，<sup>100</sup>已成為長 670 公尺，40 公尺寬能雙向多線道通車的大路（附圖九），另有許多東西向的胡同也加以修整、拓寬，以利於社區內的車流順暢與對外的交通聯繫，它北接廣安大街，南通右安門大街，並在道路底下同步建設了雨水、污水、天然氣、自來水、電信、寬頻網路、有線電視多條管線，<sup>101</sup>生活機能裝備齊全，鱗次櫛比的高樓，寬敞的街道上有著川流不息的車流量，一到晚上，整個牛街街道燈火輝煌，美不勝收。

牛街街道辦事處主任范寶在《今日牛街》中提到，宣武區人民政府也積極地招商引資，於二〇〇三年初通過落實區政府制定的扶持牛街民族特色經濟發展與優惠政策，促進牛街民族經濟的發展，滿足回族居民的生活需求，利用在街道東西兩側建成具有商業用途的 2 到 6 層樓房，形成有民族特色的商業一條街。牛街民族特色街新建了一批居有穆斯林建築風格的商業設施，匯集了多個具有穆斯林特色的商店，像牛街旁的一間間的清真餐館（大順堂、天客來、洪順軒、吐魯番餐廳）、正興德清真茶莊，也吸引了月盛齋、清華齋、聚寶源等老字號商店在清真牛羊肉市場販賣，清真超市不僅販賣 7,000 多種清真商品，在二樓更設立了清真美食街，讓年糕錢、奶酪魏等十幾家回族清真小吃入駐，提供穆斯林居民符合伊斯蘭教義且較為規範的清真飲食與基本生活機能所需。這將在本文第三章第二節有詳細的描述與討論。

### 3. 第二期工程

牛街危改二期的範圍從輸入胡同、牛街四條往南到南橫西街、棗林前街。<sup>102</sup>

---

<http://www.56-china.com.cn/mztj/9/yi9M25.htm>。

<sup>99</sup>姜鐵勇，〈南城地區改造建設巡禮－牛街危改區開發建設〉，《北京房地產》，1997 年第 1 期，頁 26。

<sup>100</sup>楊青，〈從居住環境的變化看民族凝聚力〉，頁 25。

<sup>101</sup>北京市政府社區公共服務訊息網，查詢日期：2006/1/30，「2004 年區政府在直接關係群眾生活方面擬辦重要實事計劃完成情形」，

[http://xw.bjcs.gov.cn/sqjs/sqjsAction.go?operate=view&lm=SQJS\\_JSJB&jbshj\\_id=224349](http://xw.bjcs.gov.cn/sqjs/sqjsAction.go?operate=view&lm=SQJS_JSJB&jbshj_id=224349)。

<sup>102</sup>同註 99，頁 25。

根據筆者在「焦點別墅網」中查到中國學者甘宏在《北京房地產》「北京“三區五片”危改試點加快全市危改進程」一文中說到，二〇〇〇年十一月，牛街第二期工程實行「房改帶動危改」政策，允許回遷，鼓勵外遷，自主選擇。房改計畫依照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政府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實施的「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政府關於牛街二期危舊房改造工作實施辦法」（附錄一）<sup>103</sup>中規定，回遷居民實行房改售房的價格按《關於 1999 年向職工出售公有住宅樓房的價格及有關政策的通知》通知規定的成本價每平方公尺 1,485 元人民幣和經濟適用住房價格每平方公尺 3,800 元人民幣購買其新居，此外也有工齡優惠<sup>104</sup>（每年 12.56 元人民幣）與教師優惠<sup>105</sup>等多種優惠政策，由於區政府擬定了相關的房價優惠與補償方式，截止二〇〇一年四月，已經有 63.2% 的居民簽訂了安置協定，共 2,500 多戶，其中有 2,000 多戶選擇了就地安置，少數居民選擇了外遷和貨幣安置的辦法。<sup>106</sup>

「北京市政府社區公共服務訊息網」的網頁資料顯示，於二〇〇〇年底，首批回遷戶已搬回了 90 平方公尺的牛街新房。現在，牛街的回遷住房每戶平均有 70 平方公尺，新增加了萬公尺綠地。二〇〇四年區建委公佈的統計資料顯示在牛街二期工程，已有 2,490 戶回遷。<sup>107</sup>

由宣武區牛街街道工委、辦事處主辦的《今日牛街》報紙中寫到：「牛街危改二期工程在二〇〇五年全部完成，約有五萬居民改善住房條件，與危改計畫同時並行的工程將讓牛街的 7 條市政管線全部就位，並有投資 3,200 萬元人民幣建成的回民醫院改擴建工程，將提供一流的醫療條件為居民服務，此外，投資 3,000 多萬元人民幣，佔地一萬多平方公尺建成的民族敬老院也已經完工。並建設了三個社區民族團結文化廣場，提供居民辦活動與社區連誼的場所，有 650 平方公尺的政務服務大廳、300 平方公尺的社保大廳、社區衛生站、圖書館、科普活動室、文體活動室一應俱全。」<sup>108</sup>

從《宣武報》在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內容得知，二〇〇五年將於近期啓動三項拆遷工程，其中牛街回民醫院北牆外及週邊「城中村」環境整治項目拆遷工程，東從右內大街以西，西從白廣路大街以東，南至回民醫院北牆外及白廣路東里以北，北至棗林前街以南，佔地 19,843 平方公尺，拆遷居民 334 戶，拆除房屋 5,881 平方公尺，拆遷單位有 13 個，房屋面積 4,672 平方公尺，共計 10,553

<sup>103</sup>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政府網頁，查詢日期：2006/4/3，「北京市宣武區人民政府關於牛街二期危舊房改造工作實施辦法」，<http://w.51sobu.com/policy/39001230200453181084822791687.html>。

<sup>104</sup>工齡優惠是按照購房人夫婦雙方建立住房公積前的工齡之和給予優惠。

<sup>105</sup>教師購房的條件則是依據《關於印發(房改售房中對教師購房增加優惠的規定)的通知》([96]京房改辦字第 075 號)和《關於執行〈房改售房中對教師購房增加優惠的規定〉的通知》([97]京房改辦字第 057 號)的規定。

<sup>106</sup>焦點別墅網(2001 年 4 月 17 日)，查詢時間：2006/4/3，「北京“三區五片”危改試點加快全市危改進程」，<http://villa.focus.cn/newshtml/15693.html>。

<sup>107</sup>北京市政府社區公共服務訊息網，查詢日期：2006/1/30，「2004 年區政府在直接關係群眾生活方面擬辦重要實事計劃完成情形」，

[http://xw.bjcs.gov.cn/sqjs/sqjsAction.go?operate=view&lm=SQJS\\_JSJB&jbshj\\_id=224349](http://xw.bjcs.gov.cn/sqjs/sqjsAction.go?operate=view&lm=SQJS_JSJB&jbshj_id=224349)。

<sup>108</sup>宣武區牛街街道工委、辦事處主辦，《今日牛街》，2005 年 6 月，第 97 期第三版「千年古街譜新曲—辦事處主任范寶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事蹟報告會上的發言」。

平方公尺，<sup>109</sup>拆遷後部分區域進行市政道路建設，部分土地則劃入國家土地儲蓄使用。

### 三、危改計畫對牛街回族居民的影響

不僅北京市宣武區進行危改，中國許多城市也同樣進行了舊城改造的計畫，對世居少數民族居住狀況和聚居方式也產生很大的影響。過去都市世居少數民族居住的房屋，很多都位於都市中心地帶，使用的時間已經很長，再加上家庭成員的增多，已經顯得面積狹小，房屋危舊，住房條件亟待改善。而都市的發展，特別是都市中心區商業功能的增強，也促成許多市政府著手進行舊城區的改造計畫，這樣的改造計畫使得都市回族社區的民族特點出現極大的轉變。

#### 1. 生活環境與物質條件的改善

「吃不愁，穿不愁，提起住房愁上愁」，在危房改造之前，牛街居民居住的房子以低矮破舊的平房為主，這句民謠是筆者從訪談過程中最常聽的一句話，多少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於住房條件的無奈。

回族居民馬勇先生在二〇〇〇年搬離了僅 9 平方公尺的老房子，正式搬入新家。如今，在兩室一廳的新家中，彩色電視、冷暖氣的空調設備、電腦、微波爐等電器用品一應俱全。回想起以前過的日子，現在的生活已經沒有什麼遺憾，而其考上大學的女兒正在自己的房間上網，使用的正是已經裝設完成的社區寬頻網路，讓牛街的下一代在家中就可以透過網際網路，即時了解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新聞與外界的新事物，生活機能明顯改善。<sup>110</sup>（附圖十七）

牛街從當初 7.2 公尺拓寬為 40 公尺寬的大馬路，由於交通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之後，牛街的居民開始打算買車，但買了車之後，又開始擔心沒有足夠的停車位，筆者在牛街的居民樓下看到了許多的桑塔納(Santana)、奧迪(Oudi)一輛接一輛的小車擺滿了所有的車位。如今人們生活條件好了，消費的價值觀念也提高了，不再像以前只把自己的錢花在基本衣食的支出，也願意花大錢，買新房、新車，逐步提升自己的生活水準，古老的牛街，在不斷發展的新時代煥發出迷人的新顏。

#### 2. 居民結構改變，造成精神層面的失落感

##### （1）回遷的房貸金額高昂，部分區民無力回遷

牛街在北京市屬於經濟文化欠佳的地區，相對回族的生活消費水準也較低，這在筆者購買北京市各區的礦泉水時，有著深刻的體認，同樣是「哇哈哈」牌子

<sup>109</sup>宣武報，2005 年 6 月 28 日，第三版「我區近期啓動三項拆遷工程」。

<sup>110</sup>經筆者在 2005 年 7 月 15 日前往北京牛街西里二區，訪談馬勇先生整理出的訪談內容。

的礦泉水或是可口可樂，牛街附近的超市賣價就是較為便宜。牛街的回族居民的職業，由於歷史因素多從事商業貿易、餐飲、街道工廠等單位從事勞動服務性工作，屬於勞動密集型，對於職工的教育水準和文化素質要求不高，但收入較低，勞動時間長且流動性大，牛街的雙職工的月收入大概在 3,000 到 4,000 元人民幣左右，危改的房貸幾乎就是他們的全部積蓄，甚至得向親友借錢，部分經濟能力不好的回族居民確實無力支付回遷的購房費用，但卻又滿心不願離開牛街這個居住已久的家園。

這種情形在筆者於二〇〇五年七月訪談牛街居民李學強先生時，談到當初在牛街二期工程施工期間，許多的回族正在掙扎是否要如同一期工程居民那樣搬回牛街繼續居住，隨著危改計畫逐步建設，週邊的交通與生活便利等有利因素，在在使得二期工程新大樓的房價已經今非昔比，一平方公尺就要七千多元人民幣，這樣的價錢對於一般家庭而言，其實是很大的經濟壓力與負擔，也因此有許多的回族居民在房屋拆遷後無力回遷，而選擇改住在房價較為便宜但穆斯林生活機能較為不便的地區。

## (2) 多民族雜居程度增高，明顯弱化了寺坊制度的功能，民族問題增多

許多咬著牙根也要搬回牛街居住的居民，卻發現回遷後原有的居住格局改變，本來同住在一個平房大院，過著走家串戶的生活模式，日常生活中密切往來，婚喪大事也都少不了鄰居的幫忙，如今人們搬進鋼筋水泥的樓房裡，鄰居被分隔在幾棟大樓或是隔壁社區之中，雖然有門戶相對獨立的隱密性，但卻少了那份溫馨的人情味，新的鄰里關係與民族關係都需要再重新適應與調整。

因為危改後增加的住房增多，以及部分回族沒有回遷，還有開發商出售部分樓層以平衡建設支出的因素，因此有的是其他外地遷入的穆斯林或是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得以搬進牛街社區，儘管回族在大範圍上仍相對聚居，但就單位地域內回族的密度就相對減少，多民族雜居化的程度增高，由於部分漢族居民不甚了解回族的生活習慣，時常有漢族居民提著大肉（豬肉）或酒等回族禁食的食物在電梯、社區道路等公共場合進出，碰巧遇上了回族鄰居來不及迴避，或是打開窗戶，聞到漢族使用豬肉作菜的味道等事件，總是令在傳統回族社區生活慣了的回族居民感到些許的不愉快。

回族住在已經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牛街社區裡，還能繼續保持與傳承屬於自己的民族傳統與宗教文化嗎？這個問題不僅是牛街，或是中國各地大城市裡的回族聚居區，都同樣面臨這樣的狀況，要怎樣在國家體制與社會變遷的影響之下，而不被都市的生活習慣與價值觀所左右，迷失了自己的民族身分，而持續保持回族的民族文化並加以傳承，這都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世居回族們，要加以深思的問題與考驗。底下第三章與第四章，將以經濟生活與族群關係的角度，橫向地來探討北京牛街回族經歷城市更新計畫與社區轉型的變遷因素，如何改變與適應這不同於以往的生活型態。